

清代仓储研究的梳理与思考

桂智谋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5年10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1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月6日

摘要

清代仓储制度是中国传统仓储体系的集大成者, 不仅承担着防灾救灾、平抑粮价、稳定经济的重要功能, 更是观察清代国家治理能力、社会结构变迁与经济运行模式的关键窗口。本文系统梳理了清代仓储研究的学术脉络, 将其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20世纪初期至1949年的奠基与初步探索期, 聚焦制度梳理; 1950~1980年代的停滞与缓慢复苏期, 引入国家控制等新视角; 1990~2010年代的成熟与繁荣期, 在社会史范式下转向区域、微观与互动研究; 2010年至今的跨学科整合与全球视野期, 引入GIS、量化分析等方法, 研究议题不断深化。文章在回顾学术史的基础上, 指出当前研究在边疆地区、专门仓型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并对未来深化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清代仓储, 学术史, 国家治理, 研究展望

Review and Reflections on Qing Dynasty's Granary Research

Zhimou Gui

School of History,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October 22, 2025; accepted: November 4, 2025; published: January 6, 2026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s granary system represents the cul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torage systems. It served not only critical functions in disaster relief, price stabilization, and economic regulation, but also served as a key lens for examining the Qing dynasty's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and economic operational model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academic historiography of Qing dynasty's granary research, dividing it into four developmental phases: the foundational and initial exploration period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1949, focused on institutional

description; the stagnation and slow revival period from the 1950s to 1980s, which introduced new perspectives like state control; the maturation and prosperity period from the 1990s to 2010s, marked by a social history turn towards regional, micro-level, and interactive studies; and the period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global perspective from 2010 to the present, characteriz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GIS,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other new methods, while continuously deepening research topics. Following this historical review, the article identifies current research gaps, particularly regarding frontier regions and specialized granary types, and suggests directions for future deepening research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studies.

Keywords

Qing Dynasty's Granaries, Academic History, State Governance, Research Prospect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1]，粮食储备作为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的核心议题，贯穿中国传统社会始终，在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古代社会，农业生产受到气候、水文、地理等自然条件所制约，并不稳定，水旱灾害常常打断农业生产，因此“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2]的仓储理念得以产生并指导生产实践。可以说仓储的发展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始终，从原始部落的窖藏储粮到王朝时期的制度化仓储，粮食储备体系的发展与人类文明进程深度绑定。相应的仓储制度也从萌芽逐渐发展成熟，成为调节经济、赈济灾荒、稳定社会的重要工具。

夏商时期，仓储制度已初具雏形，殷墟考古发现的仓储遗迹，证实当时早已形成规模化的粮食储备体系；西周时期出现专门的官职管理仓储；秦汉以降，分化出常平仓、义仓等具备不同功能侧重的仓储类型，仓储制度逐渐走向系统化和制度化。到唐代，仓储制度发展迅速，形成了常平仓(官办，调节市场)、义仓(官督民办，赈济地方)、社仓(民间自办，基层互助)分工明确的格局，为后世仓储制度奠定了框架。清朝建立后，在继承前代仓储经验的基础上，仓储制度进一步发展，除“三仓”外，另增设旗仓、营仓、漕仓等专门仓型，构建起了覆盖中央到基层、兼顾行政与军事的仓储网络。这一体系有力支撑了康乾盛世，而随着吏治的废弛，财政枯竭，仓储体系逐渐崩坏，面临近代化的艰难转型。

梳理清代仓储研究的学术脉络，不仅在于厘清中国传统仓储制度的发展逻辑，更可通过这一制度运行逻辑，窥探清代国家治理能力、社会结构变迁与经济运行模式的深层特征。基于此，本文将从学术史回溯与展望两个维度，对清代仓储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2. 学术史回顾

清代仓储制度研究自 20 世纪以来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百余年来，研究视角由早期制度史描述到社会史、经济史、区域史等多维度的探讨，对仓储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依据研究范式、史料运用与核心议题的差异，可将学术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并且清代仓储研究学术史紧扣中国史学发展：20 世纪上半叶制度史范式、1950~1980 年代国家控制范式、1990~2010 年代社会史范式、2010 年至今跨学科全球史范式，依次呼应考据经世、马克思史学影响、社会史复兴及跨学科全球史思潮。

2.1. 20 世纪初期至 1949 年：奠基与初步探索

这一阶段是清代仓储研究的“奠基期”，研究以制度史为核心，聚焦仓储体系的行政架构和政策演变，史料上依赖正史、政书与典志，延续乾嘉以来的考据传统。研究动机出于当时时代背景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以现实关怀为导向，学者们在晚清仓储制度全面崩溃的背景下，对清代仓储制度进行回顾，分析利害得失，为现实救灾与粮食储备提供历史借鉴。

1921 年，于树德率先发表《我国古代之农荒预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上、下)》[3] [4]一文，为仓储研究开了先河。在这篇文章中，于树德先生系统梳理了清代仓储中各类型的制度渊源以及演变脉络。以管理主体为标准，提出了常平仓、社仓、义仓的划分标准：常平仓为“官办官管”，社仓为“官督民办”，义仓系“民办自主”，这一分类方式成为后续研究的对话基础。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因为注重正史和会典材料，易将制度条文与实际执行混同，未能揭示制度在地运行情况。对仓储类型划分过于绝对，没有关注到清代三仓界限的模糊性。

1934 年，冯柳堂于《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5]一书中设专章讨论清代仓储制度，以时间为轴将清代的仓储制度从初创到完善最终崩坏的全过程清晰展现。与于树德不同，冯柳堂关注到三仓界限的模糊性，指出义仓存在“官方管控”和“民间参与”的摇摆属性，许多地方的义仓需要向官府报备粮食、遇灾时需要官府批准方可放赈。此外，本书还考察了清代各省的储额数据及其变化，对储额作了详细考察，发现各地储额不均，为后续区域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最后，该书还关注到制度的现实执行情况，揭示了清代仓储中采买、虚报等制度流弊，启发学者研究仓储制度的在地化运行。但受限于时代与视角，对各省的差异背后原因缺乏深入挖掘，对民间的参与等更加微观的层面没有足够重视，对晚清时期制度崩溃后的转型没有足够关注。

邓拓的《中国救荒史》[6]也是仓储研究重要成果，本书虽以救荒为主题，但对仓储制度的防灾救灾功能实施作了论述，揭示了仓储制度的社会稳定功能。在本书中通过分析灾荒案例，指出清代仓储在灾荒初期能通过仓储缓解灾情，但在大规模灾荒中，因储量不足与分配不均，作用有限，往往杯水车薪。这一研究视角拓展了仓储研究的维度，凸显其治理工具属性，但仍未脱离于制度史的框架之中，对仓储制度与基层社会的互动讨论不足。

1948 年，于佑虞著《中国仓储制度考》[7]详细论述了仓储制度演变脉络，设专章讨论清代仓储制度，对清代“三仓”制度作了清晰论述。此外，郎擎霄《中国民食史》[8]也对清代仓储作出制度梳理层面的论述。

这一阶段的研究对清代仓储研究奠定了制度框架，明确了三仓体系的核心概念与发展脉络，但其局限性也十分突出：首先，史料单一。清宫档案还尚未开放，地方文书未被系统整理，研究主要依赖正史以及《户部则例》和《大清会典》等上层制度文本，难以触及基层仓储的实际运行情况，导致制度与实际之间存在差距。其次，方法较为单一。该阶段延续乾嘉学派学风，缺乏社会分析、量化研究等方法，对仓储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不足。最后，区域研究薄弱。虽有学者注意到了区域之间的差异但时代所限，故而对区域差异以及基层实践论述较少。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研究为之后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对话基础，清晰地梳理了清代仓储制度的基本问题，在这一基础上，后续学者才得以更好地进行研究。

2.2. 1950~1980 年代：停滞与缓慢复苏

此一阶段是一段承上启下的过渡期，早期延续上一阶段的研究思路，对仓储制度持续发掘，对仓储的作用也提出了新的认识，后期国外学者的加入，研究引入了视角，为后续研究提供启发。

萧公权在《中国乡村：19 世纪的帝国控制》[9]中指出，清代仓储绝非单纯的“民生工程”而是清廷维持乡村治理的重要工具。清廷通过掌控仓储的管理权、分配权，将权力渗透至基层，揭示出仓储体系

与其他基层制度的相协调性，将仓储制度与国家治理关联，影响深远。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10]的研究将仓储与人口问题联系，解释了清代仓储制度崩溃的原因，认为人口增长引发的粮食供需失衡，加剧了粮储体系的运行压力。这一时期日本学者星斌夫《中国社会福利政策史》[11]对仓储研究提出了新的解释方法，他利用各地方志材料，对清代各地仓储进行了区域比较，进行了尝试性解释，对清代仓储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旨趣。在这一思路下产生了一些著作，一些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传统的制度叙事逐渐打破，新的视角逐渐被引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之中。

这一时期的清代仓储研究有了新视角、新理论的尝试，但由于史料来源的单一和主流理论的桎梏，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探索。区域研究主要集中于江南、华北、其他地区，尤其是边疆区域研究不足。然而这一阶段对清代仓储研究仍然是承上启下的，萧公权的“社会控制论”关注到了以往研究忽视的制度作用，星斌夫对区域之间的比较启发了之后的区域研究热潮。有了这一时期的成果支撑，在下一阶段清代仓储研究发展迅速。

2.3. 1990~2010 年代：成熟与繁荣

这一阶段是清代仓储研究走向成熟和繁荣的关键期，90 年代档案的开放使得研究更加精细化发展，学者们得以从宏观制度描述转向对仓储具体运作机制的微观研究，由此产生了大量高质量论著。

张岩作《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12]一文，较早地利用档案史料对清代仓储制度进行研究，文章不仅对制度条文描述，还量化分析了常平仓谷物的多种来源渠道如捐纳、采买、截漕等方法，揭示了常平仓“以仓养仓”的经营模式及其内在矛盾。该文可视为清代仓储研究的转向标志——从“制度文本”的解读转向“实际运作”分析。其后研究继续深化。

康沛竹《清代仓储制度的衰败与饥荒》[13]将仓储制度的演变与清代中后期的社会危机(饥荒)直接联系起来。通过档案中的亏空案例，深刻揭示了吏治废弛是导致仓储衰败、使其在关键时刻“难敷其用”的根本原因。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探讨了国家救灾能力下降的制度性根源。突破了单纯制度史的描述，开始关注制度绩效与社会后果。

李映发《清代州县储粮》[14]将研究视角下沉到州县一级，聚焦于基层仓储的实际情况。文章详细论述了州县各种仓储的积谷来源、仓廩管理、赈余办法，并较早地指出清代州县仓储在数量和规模上超越前代，但在中期以后因管理不善而走向衰微，填补了基层粮储研究的空白。

此后受社会史思潮影响，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将仓储视为单纯的制度，而是将其看作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场域。研究视角从“自上而下”变为“自下而上”或“上下互动”，强调区域差异和多元行动者(士绅、宗族、商人)的角色。

首先打出旗帜的是学者陈春声关于广东仓储的研究，如《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15]。作为社会史转向的旗帜性学者，其研究突破了传统仓储史聚焦制度沿革与救荒功能的范式，明确指出仓储问题并非单纯的经济或救荒议题，而在本质上属于社会问题范畴；其运作逻辑与实践过程，实质上是国家与地方力量依托粮食资源进行社会控制的具体体现。其研究将仓储研究彻底从制度史带入社会史领域，启发了大量关于士绅与地方社会的研究。

吴滔的江南仓储研究，如《论清前期苏松地区的仓储制度》[16]聚焦于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揭示了仓储与市镇经济的复杂关系。他发现苏松地区的仓储呈现出明显的“仓储市场化”倾向，如义仓将积谷银两投资于典当、房产以获取租金收益，从而维持运转。这打破了仓储纯为“备荒”的传统形象。开创了从经济史和社会史角度研究仓储的新路径，强调了地域经济的特殊性。

白丽萍两湖地区社仓的研究《清代两湖的社仓建设》[17]重点关注社仓这一“民办”色彩更强的仓型。她的研究揭示了社仓建设与宗族势力的紧密结合，宗族通过控制社仓的管理权和资源，进一步巩固和扩

大其在地方社会的权威和影响力。深化了对仓储与基层社会组织(尤其是宗族)关系的认识,展示了区域内部的多样性。

郑民德《明清京杭运河沿线漕运仓储研究》[18]选取了运河这一线性空间作为研究单元,探讨了位于运河节点的漕运仓储(如淮安仓、德州仓)。这些仓储不仅服务于漕运,也深刻介入地方社会的赈济、平糶,成为央地资源博弈的焦点。拓宽了仓储研究的空间范畴,揭示了国家漕运体系与地方社会经济的互动。社会史研究范式的转型,为清代仓储问题的学术探索注入了全新活力,推动该领域研究呈现出多维度、深层次的发展格局。

学界以区域个案为基础展开深度实证考察,通过对不同时空背景下仓储运作机制、管理模式及社会互动过程的细致梳理,系统揭示了清代仓储实践所蕴含的复杂面相与多元特征。在此研究视域下,仓储体系已超越其作为经济与社会保障设施的单一属性,成为解析清代国家权力运作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形态及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核心分析维度,为深理解清代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模式提供了关键学术路径。

这一阶段的学术演进轨迹,清晰勾勒出清代仓储研究从聚焦制度文本的实证考辨,逐步转向嵌入社会场域的深度解读之完整学术脉络。此过程不仅实现了研究视角的重要跃迁——即从对仓储制度本身的静态梳理,拓展至对仓储与社会结构、经济运行、基层治理互动关系的动态分析,更通过学术问题意识的更新与研究方法的积累,为2010年代以来该领域开展跨学科整合研究(如融合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构筑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亦为后续研究突破单一学科框架、挖掘仓储议题的多重历史意涵提供了关键学术铺垫。

2.4. 2010年至今:跨学科整合与全球视野

此阶段研究进一步细化,在延续社会史、区域史视角的基础上,方法论创新显著,研究尺度丰富,同时近五年间涌现出一批结合新史料、新理论的成果,推动清代仓储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首先研究引入科学计量方法,将GIS空间差异与量化验证。马丽、方修琦团队在《清代常平仓粮食储额的空间格局》[19]中发现清代各地仓储储额的区域性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填补了清代常平仓研究的空间空白,构建了储额空间格局的分析框架。研究得出清代常平仓储额呈现出“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并作出归因,为后续历史地理与荒政研究提供了范式参考。

吴四伍《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考察》[20]则关注到三仓的实际绩效:常平仓盈利能力有限,常常亏空。社仓与义仓自身经营能力较弱、依赖捐输运行的常态。修正了学界对于清代仓储制度运行实际效用的评估,提出清代仓储制度衰败应归咎于清廷治理水平和经济意识的不足。

闫文博《清代仓储亏空的官吏赔补制度》[21]系统考察了清代仓储制度运行中亏空后官吏赔补机制,总结亏空成因:如采买成本上涨、挪用粮储经费等,指出赔补制度执行不力导致亏空积重难返,成为清代治理危机的重要诱因,深化了对粮储管理制度缺陷的认识。

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跨学科、全球化的特征,其创新之处在于:首先,方法革新。引入GIS、量化分析、环境史等跨学科方法为仓储研究提供新工具。其次,议题深化。聚焦经营绩效、环境影响等新问题。最后,视野拓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国际比较。但仍然存在可拓展的空间:一是对边疆地区的仓储研究仍然薄弱;二是对旗营、营仓等专门类型的深入不够;三是跨学科方法的应用仍可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清史学界在整体上呈现出若干显著趋势,这些趋势不仅呼应了前述的跨学科整合方向,更将在与仓储研究有关的国家治理、灾害救济和社会经济史领域三个维度,为仓储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与方法论启示。

近来关于清代国家治理研究中,研究者愈发倾向于从具体的制度运作中,揭示清代国家能力的强度、

限度以及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复杂互动。在国家治理核心议题的财政与人事方面,涌现出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如吴四伍《清代纳捐与国家治理》[22]和周健《雍正之供养——清代国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23]。在灾荒救济方面,数字人文的引入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社会经济史上,清史研究者也在积极拥抱新技术,如数字人文和 GIS 等,继续推进研究向纵深发展。这些新的趋势将使清代仓储研究获得更大空间。

3. 研究展望

百余年来,学界对清代仓储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存在诸多可拓展的空间。结合当前学界注重“整体视野”、“微观实证”与“跨学科融合”的趋势,以及新见地方文书、档案史料的发掘研究条件下,未来研究或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3.1. 边疆地区仓储研究的深化

目前,清代仓储研究主要集中于江南、华北等内地区域,对边疆地区的研究略显不足,未来可利用相关史料开展研究。如在《清代新疆档案汇编》《西藏奏疏》等档案中发掘有关边疆地区的仓储制度特点,除了官方档案外,也可发掘边疆地方文书中的有关内容,与内地仓储作对比研究。此举可深化对清代制度运行以及治理逻辑的认识。

3.2. 专门仓型的研究拓展

三仓体系的归纳总结为后续清代仓储研究提供了基础,但除三仓外,对清代特有的“旗仓”、“漕仓”等专门类型的研究仍稍显不足,未来研究或可关注到这些特殊的仓储类型。如利用《八旗通志》《伊江汇览》等材料考察旗仓制度特点及运行情况。

4. 结语

本文提出的“四阶段划分法”是为清晰呈现学术脉络而设定的分析工具,需承认其局限性。历史上学术发展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各阶段并非全新开始,而是对前一阶段的继承与发展,例如:1950~1980年代萧公权的“国家控制论”,实则延续了1920~1949年冯柳堂对国家治理能力考察的关切。同时,同一时期内,多种研究范式往往并存,而非单一主导,例如:1990~2010年代虽以社会史范式为主,但康沛竹仍沿用制度史方法分析仓储的衰败。但是作为分析工具,它仍能清晰呈现清代粮储研究的整体脉络。

清代仓储制度作为中国传统仓储体系的“集大成者”,不仅承载防灾救灾、稳定经济的功能,更折射出清代国家治理能力、社会结构变迁与经济运行模式的深层特征。百余年来,学界从制度史到社会史、从宏观描述到微观实证、从中国内部到全球比较,逐步揭开清代仓储的复杂面相,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随着史料的不断挖掘与研究方法的持续创新,清代仓储研究仍有广阔的拓展空间——边疆与民族地区仓储、专门仓型、跨学科应用、全球比较等方向的深入探索,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清代仓储制度的认知,也为理解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逻辑提供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 [1] 班固. 汉书[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 [2] 郑玄, 著. 孔颖达, 疏. 礼记正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3] 于树德. 我国古代之农荒预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上) [J]. 东方杂志, 1921, 18(14): 18-30.
- [4] 于树德. 我国古代之农荒预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下) [J]. 东方杂志, 1921, 18(15): 18-33.
- [5] 冯柳堂. 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 [6] 邓拓. 中国救荒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 [7] 于佑虞. 中国仓储制度考[M]. 南京: 正中书局, 1948.
- [8] 郎擎霄. 中国民食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 [9] 萧公权, 著. 中国乡村: 19 世纪的帝国控制[M]. 张皓, 张升,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8.
- [10] 何炳棣, 著.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 [M]. 葛剑雄,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 [11] 星斌夫. 中国社会福祉政策史の研究[M]. 東京: 国書刊行会, 1985.
- [12] 张岩. 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J]. 清史研究, 1993(4): 28-39.
- [13] 康沛竹. 清代仓储制度的衰败与饥荒[J]. 社会科学战线, 1996(3): 186-191.
- [14] 李映发. 清代州县储粮[J]. 中国农史, 1997(1): 34-48.
- [15] 陈春声. 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J]. 学术研究, 1990(1): 76-80.
- [16] 吴滔. 论清前期苏松地区的仓储制度[J]. 中国农史, 1997(2): 40-49, 66.
- [17] 白丽萍. 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建设[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6(1): 75-81.
- [18] 郑民德. 明清京杭运河沿线漕运仓储系统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天津: 南开大学, 2013.
- [19] 马丽, 方修琦. 清代常平仓粮食储额的空间格局[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9, 24(3): 68-74, 91.
- [20] 吴四伍. 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考察[J]. 史学月刊, 2017(5): 52-67.
- [21] 闫文博. 清代仓储亏空的官吏赔补制度[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7(4): 75-80, 224.
- [22] 吴四伍. 清代纳捐与国家治理[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 [23] 周健.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